

尼日利亚阿夸-依邦州的妇女非政府组织及针对农村妇女的赋权活动

英尼奥邦·A·艾克帕比奥

导 言

将所有人尤其是穷人和妇女融入到发展进程中的必要性,以及人们意识到自上而下实行集中管理的大型公共组织可能无法对自下而上的、以需求驱动的行动作出迅速反应,因而,非政府组织(NGO)应运而生。威利特(Willett 2006)将非政府组织定义为:由为了实现某种共同目标,而不是为了谋取公职、赚钱或从事非法活动而持续地在一起行动的人们组成的独立、自愿联合体。更准确的定义是威拉德和科普斯泰克(Wellard and Copestake, 1993, p.5)作

出的,他们将非政府组织界定为“登记在册的、私人的、独立的非盈利性组织”。以上述两种定义为背景,非政府组织通常被认为是政府领域与商业领域之间的某种第三部门(Ofosu-Appiah 2003)。据称,非政府组织通常对贫困社区、少数民族群和妇女的需要和愿望比较敏感,在穷人眼中,非政府组织比大多数政府组织机构更具有合法性(Ofosu-Appiah 2003)。

国际社会和许多国家政府越来越感受到非政府组织的重要性,形成此种认知的

原因,在于非政府组织在民主多元主义中扮演的角色,人们希望它们能分担提供某些发展服务所需支付的成本,而且人们感受到了它们在帮助农村贫困人口方面的能力(Wellard and Copestake, 1993, p.5)。非政府组织的地位在不断提升,并达到了更高、更多元的维度。据斯坦贝格(Steinberg, 2001)报告,作为一个群体,非政府组织发放的援助超过了整个联合国系统,分发的款项超过了世界银行。据奥佛苏-阿皮阿(Ofosu-Appiah, 2003)的估计,2002年,由非政府组织管理的对非洲的外部援助接近35亿美元,而1990

年还不到10亿美元。

非政府组织在妇女解放和确保妇女参与发展进程中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如果考虑到以下事实,这种作用更是十分重要:在非洲,居住在农村地区的妇女约有5.65亿,占人口的60%(Clark, 1994)。虽然妇女在农业、农村和国家发展中起到不可缺少的作用,但她们仍然受到由来已久的歧视和偏见,这导致妇女在社会中被边缘化。另外,妇女们优先考虑的问题也鲜能反映到农业或国家发展的研究或政策当

英尼奥邦·A·艾克帕比奥(In-iobong Aniefiok Akpabio)博士在尼日利亚乌约(University of Uyo)大学农业经济与推广系任教。她的主要研究兴趣是农业推广、发展中的妇女角色和环境社会学。Email: dr_akpabio@yahoo.com

中。然而,妇女在社会中的重要地位,如何强调也不为过。卡尔(Karl,1995)宣称,如果在生活的各个领域和各级决策中没有女性与男性的平等参与,就不可能实现人民对政府治理和发展的真正参与。我曾论证过,妇女对发展进程的贡献能力取决于其对各个级别决策过程的参与程度(Akpabio,2000)。《联合国千年宣言》注意到了性别平等在反贫困、反饥饿和鼓励真正可持续发展工作中的中心地位(United Nations,2000)。通过这样的做法,“宣言”赋予1995年在中国北京第四届世界妇女大会制定的“行动纲领”的愿景以崇高地位。在国际机构和各国政府通过法律提供使妇女能融入国民经济环境的同时,妇女们也在通过自己组成以赋权为目的妇女非政府组织(WNGO)对这种融合过程作出贡献。妇女非政府组织的主要目标群体是妇女和女童,主要目标是妇女解放、提高生活水平和反对性别不平等(Karl,1995)。这些组织协调和资助妇女发展项目,帮助妇女发挥其传统优势,促进其参与在农村和贫困城镇地区以可持续发展为目标的人力资源 and 自然资源开发活动。本质上,妇女非政府组织是通过集体行动来动员农村妇女改善生计,而不是集中于追求单个个人的目标,或是向政府寻求解决方案。

妇女非政府组织的影响越来越大,对其也有很多不同的看法和评价。有学者认为,这些组织在接触贫困人口及关注其需要方面具有优势,并且富有活力,能有效地将资源分配给需要帮助的人(Wellard and Copestake,1993)。卡尔(Karl,1995)将它们视为“世界的政治良心”,他认为,妇女非政府组织对政府活动起到监督约束作用,如果没有它们,公民社会就不可能长期存在。伊耶勒和姆班纳索尔(Ijere and Mbanasor,1998)指出,这些团体的独立性

及其取得的成绩,常常使那些认为妇女没有能力为了特定目标而自行组成团体的人惊叹不已。另一方面,斯坦贝格(Steinberg,2001)也注意到,妇女非政府组织缺乏问责制,是使其在全球决策过程中的作用受到争议的主要原因。奥佛苏-阿皮阿(Ofosu Appiah,2003)曾嘲笑妇女非政府组织功能论者将自己的组织视为商业冒险项目,“通过欺诈手段为自己谋取非法钱财”。

基于本研究的目的,我们强调的是,在尼日利亚阿夸-依邦州(Akwa Ibom State)运营的许多妇女非政府组织开展了很多使农村妇女受益的活动。这些组织通过已有或临时建立的团体与农村妇女接触。穆库特(Mukute,2002,p.138)注意到,妇女非政府组织与农村团体合作的动机在于赢得合法性,帮助当地团体发展,更有效地参与社区发展进程。因此,考查农村地区的受益人是否对妇女非政府组织的社会经济赋权活动持同样的看法,是很有意思的。本项研究的构想,正是为了尝试记录尼日利亚阿夸-依邦州农村妇女参与妇女非政府组织开展的活动的感受及对这些组织在当地开展活动的评价。具体来说,我们试图确定研究区域的妇女非政府组织受益人的社会经济属性、确认受益人对影响其参与妇女非政府组织活动的因素的感受、这些组织对改善受益人社会经济状况作出的贡献,以及当地妇女团体(LWG)在参与妇女非政府组织活动时,对成员数量和参与度造成影响制约因素。本研究还试图确定,农村妇女参与妇女非政府组织活动之前的收入与参与妇女非政府组织活动之后的收入之间是否存在显著的相关性。

材料与方法

本研究在尼日利亚阿夸-依邦州进

行,该州位于尼日利亚东南部轴心地区,面积 8421 平方公里。据尼日利亚人口委员会(Nigeria Population Commission ,NPC) 2000 年的统计数字,该州人口为 240 万(NPC 2000 ,p.46),人口密度约为每平方公里 350 人,是全国人口密度最高的地区之一。其中,约有 80%的人口居住在农村,半数以上的农村人口为女性(NPC ,2000)。

本研究的样本框是隶属于在该州妇女事务部正式注册的 29 个妇女非政府组织的当地妇女团体成员。基于本研究的目的,我们特意选取了 3 个活跃于全州范围、参与农业和农村发展活动的妇女非政府组织:妇女卫生和经济发展协会(Women's Health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Association ,WHEDA),经济赋权妇女联合会(Women United for Economic Empowerment ,WUEE),女士发展中心(Our Ladies' Development Centre ,OLADE)。随后,采用多层抽样方法,从隶属于这 3 个妇女非政府组织的 24 个当地妇女团体中选取了 120 名被调查者(表 1)。

表 1 抽样程序(样本量)

WNGO	隶属在其之下的 当地妇女团体	抽样团体	应答者
WHEDA	36	8	40
WUEE	28	8	40
OLADEC	53	8	40
总计	117	24	120

注:OLADEC——女士发展中心;WHEDA——妇女卫生和经济发展协会;WNGO——妇女非政府组织;WUEE——经济赋权妇女联合会。

资料来源:作者实地调查,2006。

我们通过结构式问卷(事先已通过预测试及验证)和相应的深度访谈得到各种数据,并运用描述性的(频率、百分比、平均值、排序)和推论性的(皮尔森积矩相关

分析和多元回归分析)统计学工具对数据加以分析。为实现研究的具体目标,针对不同目标询问了不同的问题,被调查者表达其对每道题目的态度倾向。运用李科特 3 级量表(a three-point Likert continuum):选(1)表示“不同意”、选(2)表示“不确定”、选(3)表示“同意”;或逆向排序,即选(3)表示“不同意”、选(2)表示“不确定”、选(1)表示“同意”——视情况确定不同的赋值方法。之后,根据各个题项计算态度倾向的分值,再依据所讨论的具体问题界定分界点(cut-off points)。

就妇女非政府组织对提高妇女社会经济地位所作的贡献而言,以分界点平均值 2.5 来区分“认知为有效的因素”(x \geq 2.5)和“认知为无效的因素”(x<2.5)。就影响受益人参与妇女非政府组织活动的因素而言,以分界点平均值 2 来区分“认知为可能参与的因素”(x \geq 2.0)和“认知为不太可能参与的因素”(x<2.0)。最后,以分界点平均值 1.5 来区分“认知为主要制约因素”(x \leq 1.5)和“认知为较不重要的制约因素”(x>1.5)。

结果与讨论

妇女非政府组织受益人的社会经济属性

表 2 中值得注意的是,只有 23%的被调查者年龄在 60 岁以上,并且只有 50%的被调查者是已婚妇女。约 67.5%的被调查者,家庭规模在 1 人到 6 人之间。只有 25.8%的被调查者没有受过正规教育,而对于 48.3%的被调查者来说,务农是其主要职业。表 2 还显示,有 45%的被调查者加入妇女非政府组织的时间为三年或少于三年,而 65%的被调查者只从妇女非政府组织的赋权活动中受益过一次。同样令人惊讶的是,被调查者回答了加入妇女非政

府组织对增加收入的作用——在加入妇女非政府组织之前,被调查者中,月收入低于1万尼日利亚奈拉(NGN)者占65.9%,而在加入妇女非政府组织之后,仅有16.7%的被调查者月收入低于1万尼日利亚奈拉。总的来说,农村各个阶层的妇女都从妇女非政府组织开展的赋权活动中受益。有的农村妇女加入这些组织的时间较迟,仅从这些组织的贷款服务中受惠过一次,但这转化为她们在经济活动中收入的提高。

表2 加入妇女非政府组织的被调查者的社会经济属性(样本量 N = 120)

属性	频率	百分比
年龄(岁)		
21 以下	12	10.0
21—40	41	34.2
41—60	39	32.5
60 以上	28	23.3
婚姻状况		
已婚	60	50.0
单身	24	20.0
离异	6	5.0
丧偶	30	25.0
家庭规模		
1—3 人	37	30.8
4—6 人	44	36.7
7—10 人	29	24.2
10 人以上	10	8.3
教育状况		
未受教育	31	25.8
小学教育	45	37.5
中学教育	32	26.7
高等教育	12	10.0
主要职业		
务农	58	48.3
贸易	30	25.0
公共服务	12	10.0
食品加工	20	10.7
加入组织的年限		
1—3 年	54	45.0
4—6 年	34	28.3
7—9 年	20	16.7

10 年以上	12	10.0
受惠次数		
一次	78	65.0
两次	32	26.7
三次	7	5.8
四次或四次以上	3	2.5
加入组织前月收入		
5000	26	21.7
5000—10000	53	44.2
10000—15000	31	25.8
15000—20000	10	8.3
> 20000	-	-
加入组织后月收入		
5000	3	2.5
5000—10000	17	14.2
10000—15000	44	36.7
15000—20000	34	28.3
> 20000	22	18.3

资料来源 :作者实地调查 ,2006。

影响受益人参与妇女非政府组织开展的活动的因素

被调查者作答的情况反映出,在题中给定的10个因素中,有6个因素对当地团体成员参与妇女非政府组织开展的活动产生了正面的影响(见表3)。其中,最主要的3个影响因素分别是:意识程度($x = 2.52$)、团体的目标($x = 2.39$)和团体的领导及管理风格($x = 2.39$)。被调查者认为最不重要的3个因素分别是:职业($x = 1.27$)、年龄($x = 1.45$)和家庭规模($x = 1.56$)。国际农业生产者联盟(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Agricultural Producers, IFAP, 1992)强调,成功获得当地团体支持的非政府组织,是被认可为“农村穷人的合法代言人、有着明确界定的目的和目标的组织”。非政府组织的这种地位,是通过“由成员驱动的议事日程”——想妇女及其家庭之所想、供妇女及其家庭之所需(Dikito-Wachtmeister, 2001)而实现的,是以

得到外界承认和合法性(IFAP,1992)为基础的。参与妇女非政府组织活动的意识,总体上与认可度和合法性有关。斯特林菲洛等人(Stringfellow et al.,1997 p.4)同样注意到,水平较高的妇女非政府组织领导者,能通过教育和培训向参与者赋权。在团体领导风格方面,贝宾顿等人(Bebbington, et al.,1994)强调,成功的非政府组织必须有具备管理和行政技能的强有力的领导层。他们认为,这些属性确保了团队的成功合作(这一因素在本次调查中排名第5)、确保了妇女非政府组织及当地妇女团体开展的活动善始善终。研究还表明,预付给参与者的小额信贷款项(这一因素在调查中排名第4)是受益人参与妇女非政府组织开展的活动的动力。小额信贷的吸引力在短期内看似合理,但是,长期来看,德克勒克(de Klerk,2004)和卡普兰(Kaplan,1999)提醒人们注意,这一趋势可能导致依赖性,而依赖性会对发展生产起反作用。最终,小额信贷可能主要服务于社会的(消费与炫耀)需求,而不是服务于发展经

济的需求。这可能使受益人的信用级别降低,使其陷入“坏帐”困境,并摧毁培养其自力更生能力的发展道路,而这条道路是通向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所在,也是“生成收入来源活动”的合法目标。

博伊德(Boyd,2006)报告说,孟加拉乡村银行(Grameen Bank of Bangladesh)2001年的预支贷款有五分之一逾期未还。他指责该银行发放新贷款,累计利息,只不过是使旧贷款按时归还的故事继续下去。在此种背景下,世界银行(World Bank,1996)宣布,能对农村发展发挥影响的最成功团体,是那些大部分借贷资本筹自其成员储蓄的团体。关于这一点,穆库特(Mukute,2002)注意到,妇女非政府组织与当地妇女团体合作的动机在于帮助后者发展,以便它们最终可以自我维持。人们希望情况确实如此,否则,在对农村发展加大投入力度方面,可能会存在限制。

被调查者的年龄、职业和家庭规模不是影响研究区域妇女对非政府组织开展活动

表3 影响受益人参与妇女非政府组织开展的活动的因素

因素	选项			平均值	排序	各因素在统计上的显著性
	频率(百分比)					
	同意	不知道	不同意			
被调查者						
意识程度	74(61.7)	34(28.3)	12(10.0)	2.52	1	较显著
收入水平	50(41.7)	43(35.8)	27(22.5)	2.19	6	较显著
年龄	12(10.0)	30(25.0)	78(65.0)	1.45	10	较不显著
家庭规模	18(15.0)	31(25.8)	71(59.2)	1.56	9	较不显著
教育水平	19(15.8)	39(32.5)	62(51.7)	1.64	8	较不显著
职业	8(6.7)	16(13.3)	96(80.0)	1.27	11	较不显著
发放贷款额度	58(48.3)	41(34.2)	21(17.5)	2.33	4	较显著
与当地妇女团体对接的 妇女非政府组织的目标	69(57.5)	29(24.2)	22(18.3)	2.39	2	较显著
年龄	20(16.7)	39(35.5)	61(50.8)	1.66	7	较不显著
团队合作水平	50(41.7)	45(37.5)	25(20.8)	2.20	5	较显著
领导/管理风格	65(54.2)	37(30.8)	18(15.0)	2.39	2	较显著

资料来源:作者实地调查,2006。

的参与度的主要因素。埃孔(Ekong, 2003)在提及尼日利亚的情况时说,就农村地区的参与情况而言,年龄比受教育水平更重要。关于职业的影响,陈及其同事(Chen et al., 2005)表示,在非正式经济(informal economy),即大多数被调查者工作的经济部门中,结成团体是弱势群体抗争的最重要方式之一。即便如此,年龄、职业和家庭规模也不是显著影响受益人参与妇女非政府组织开展的活动的因素,这种情况可能是由于我们选取的样本结构所导致的——被调查者的年龄段和家庭规模分布较为均匀,而所有的被调查者都以农业生产为主业或副业。因此,就很难找出差异性。

影响受益人参与的显著因素

为了区分影响当地团体成员参与妇女非政府组织开展的活动的因素,我们做了一次尝试。多元回归分析(表4)显示,6个主要变量中的4个显著地影响了受益人的参与。这些因素是:收入($b = 0.528$)、妇女非政府组织的目标($b = 0.049$)、领导风格($b = -0.159$)、意识($b = 0.879$)。就收入而言,我们已经看到,65.9%的被调查者在参与妇女非政府组织开展的活动之前,月收入水平低于1万尼日利亚奈拉。

表4 影响受益人参与妇女非政府组织开展的活动的显著因素

变量	B	t- 比率	显著性
常数	0.939	0.465	0.643
意识	0.879	2.161*	0.033
收入	0.528	3.458**	0.000
贷款服务	0.413	1.148	0.253
目标	0.409	1.990*	0.003
团队合作	0.401	1.175	0.242
领导风格	0.159	2.131*	0.002

注: * $p = 0.05$; ** $p = 0.01$

资料来源:作者实地调查,2006。

这与先前在此领域开展的研究所得的结论是一致的,这些结论已在前面引述过(Akpabio, 2000; Bebbington et al., 1994; Chen et al., 2005)。实质上,从影响研究区域中受益人参与妇女非政府组织开展的活动的显著因素方面看,情况似乎是:人们受到鼓励去参与得到认可和具有可行性的妇女非政府组织开展的活动,这些组织具有负责任的管理和领导结构,所参与的活动符合社区低收入个体的需要。

妇女非政府组织对提高妇女社会经济地位的贡献

表5显示了被调查者关于妇女非政府组织对其提高社会经济地位的不同贡献的认知。被调查者认为,这些组织普遍在提升她们的收入水平、卫生意识和获得食品加工技能等领域作出了贡献。在题中列出的10项中,有5项被认为对改善其社会经济状况作出了贡献:收入水平提高(位列第一, $\chi = 2.85$)、获得小额信贷的几率提高(位列第二, $\chi = 2.83$)、计划生育的意识和实施方法(位列第三, $\chi = 2.80$)、妇女权利意识增强(位列第四, $\chi = 2.69$)、食品加工技能提高(位列第五, $\chi = 2.51$)。但是,妇女非政府组织在五个方面被认为不具效力,其中三个最不力的方面是:利用经过改进的耕作方法(位列第十, $\chi = 1.82$)、营养状况改善(位列第十一, $\chi = 1.72$);记录保存能力提高(位列第十二, $\chi = 1.64$)。

现有的相关文献中有很多关于小额信贷对妇女及其家庭经济地位的提升有积极作用的发现。国际粮食政策研究所(International Food Policy Research Institute, IFPRI)宣称,提供贷款可以减少贫困,使妇女与其配偶一起成为在子女、家庭总支出等事务上的共同决策者,改善营养和食品安全(特别是子女的食品安全),并通过减

表5 妇女非政府组织对妇女社会经济状况改善的贡献

题项	应聘范畴			平均值	排序	贡献的有效性
	不同意	不知道	同意			
识字率提高	22(18.3)	29(24.2)	69(57.4)	2.39	6	无效
政治意识或政治参与度提高	47(39.2)	39(32.5)	34(28.3)	1.89	9	无效
收入水平提高	3(2.5)	12(10.0)	105(87.5)	2.85	1	有效
食品加工技能提高	12(10.0)	35(29.2)	73(60.8)	2.51	5	有效
卫生状况改善或卫生意识增强	20(16.7)	37(30.8)	63(52.6)	2.36	7	无效
营养状况改善	54(45.0)	46(38.3)	20(16.7)	1.72	11	无效
对女性割礼等消极卫生或文化行为的意识增强	28(23.3)	44(36.7)	48(40.0)	2.17	8	无效
妇女权利意识增强	9(15.0)	18(15.0)	93(77.5)	2.69	4	有效
利用经过改进的耕作方法	50(41.67)	42(35.0)	28(23.3)	1.82	10	无效
对计划生育的意识或实施方法	7(5.8)	10(8.3)	103(85.5)	2.80	3	有效
获得小额信贷的几率提高	6(5.0)	9(7.5)	105(87.5)	2.83	2	有效
记录保存能力提高	62(51.7)	39(32.5)	19(15.8)	1.64	12	无效

资料来源:作者实地调查,2006。

少高风险的性交易来减少艾滋病对食品安全构成的威胁(IFPRI,2005)。汗德克(Khandker,1998,p.2)认为,向妇女预支贷款,等于提供就业机会,确保了她们收入的提高,使因收入的季节性而导致的消费波动趋于平缓,并增加了人们的选择余地,可以优化资源配置(包括在不同时间,以及在家庭与外部活动之间的合理配置)。妇女非政府组织为提高妇女对基本社会问题和卫生问题(位列第三和第四)的意识所作出的努力,得到了被调查者的赞许。这与奎苏姆宾(Quisumbing,2003,p.9)的以下发现是一致的:教育妇女(提高其意识)是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促进社区和国家发展的重要方法之一。换言之,让目标群体,即农村妇女,关注其基本权利,可帮助其适应农村社区的发展,并作出建设性的贡献。

位列第五的食品加工技能提高,被调查者认为是有效的,其排名确证了妇女非政府组织的基本目标之一,即提高受益人

的获得收入能力。农业生产是研究区域内的主要职业,这里已经有许多农业推广代理机构,代表若干参与提高改善耕作方法的政府机构。结果,被调查者认为,从已经改善的耕作方法(位列第十)中已经学不到什么新东西。被调查者还提到,在研究区域内,基本农产品的种植时间相对较长,回报潜力较低。根据她们的回答,因造价低廉、后期管理不善等原因造成的基础设施(道路和储存设施)差及基础设施受损问题,导致全年总收成损失约60%。这些都对农业生产造成了很大的不利影响,对所研究区域农民的总收入没有多大贡献(Akpabio,2000),特别是对于最贫困的农户而言。事实上,研究区域内的农民从棕榈油、豆糕和“加里”(garri,一种木薯的加工派生产品)等加工粮食作物产品和肥皂、洗衣粉等工业产品的销售中获得更多的收入(Akpabio,2000)。这解释了为什么被调查者更倾向于参与教育性活动,因为这样

可以提高她们的加工技能,使食物处理程序增值,延长产品上架时间,从而通过在更长时间内扩大销售来保证稳定的收入。以上发现,或许能推动妇女非政府组织集中关注食品加工方面的活动。

令人惊讶的是,营养状况的改善($x = 1.72$)仅仅位列十一。被调查者表示,她们意识到补充营养更有利于健康生活,但由于收入太低,她们实际上无法改善自己的营养状况。相反,被调查者认为,如果收入水平提高,她们将更容易接受提高改善营养状况意识方面的项目。政治意识和政治参与度位列第九,倒不令人惊讶,因为这项活动本非此项研究所探讨的妇女非政府组织的基本目标。据假设,政治意识提高和政治参与,有赖于先满足基本生存需要和克服文化障碍。对女性割礼等消极卫生或文化行为的意识增强($x = 2.17$)这一项评价不高,位列第八,这大概与处理女性割礼等文化障碍所涉及的问题不无关系。不过,重要的是要看到这样的事实:正因为女性人权倡导者富有活力的倡导和妇女意识的提高,割礼现在已经相对很少见了。

最后,像记录保存能力的提高(位列第十二 $x = 1.64$)这样重要的活动,竟被列在妇女非政府组织对改善妇女社会经济活动贡献中的末位。缺乏记录,可以说是农村发展活动失败的祸根,对国家统计数据起负面作用。“尼日利亚的统计数据建立在猜测基础上”成了一句格言,导致尼日利亚当局和国际组织发布的有关尼日利亚的统计指标多种多样,互相矛盾。记录保存状况差,在围绕本研究开展的实地调查中显露无遗。被调查者在提供信息前,需要做相当多的心算,特别是在关涉经济活动的方面。妇女非政府组织需要评估当地原有的记录保存方法,以便采用创新性的方法来传授经过受益人改进的方法。这将对妇

女非政府组织开展的社会经济干预活动的可持续性产生积极的影响。

影响当地妇女团体参与妇女非政府组织开展的活动的制约因素

表6显示,被调查者认为,在10个制约因素中,有5个是主要的制约因素,其中,最主要的3个制约因素分别是:当地妇女团体成员拒绝还贷(位列第一 $x = 1.19$)、信贷服务不力(位列第二 $x = 1.30$)、当地妇女团体成员拒绝履行预期的义务(即受益人使用贷款不当,位列第三, $x = 1.35$)。被调查者认为最次要的3个制约因素分别是:当地妇女团体成员不守法(位列第十 $x = 2.13$)、当地妇女团体领导者不太负责(位列第九 $x = 2.66$)、领导层腐败且不诚实(位列第八 $x = 1.70$)。

缺乏资金是尼日利亚当地妇女团体发展面临的主要障碍(Akpabio, 2000)。妇女非政府组织充当了这些当地团体的主要信贷资源。由于妇女非政府组织的客户面较广,可能难以满足来自各方各面的对小额信贷的需求,因而由妇女非政府组织实施的信贷计划的基本目的,是向当地受益人群体赋权,通过汇合其资源来帮助最需要帮助的成员,使当地妇女团体能自我维系,并且最终开展社区发展活动。这符合世界银行(World Bank, 1996)的观点,即最成功的当地团体,是那些大部分借贷资本筹自其成员储蓄的团体。因此,妇女非政府组织迫切需要扩大资金来源,以便在短期适应当地妇女团体广大服务对象的需求,而从长期来说,则是要对当地妇女团体进行能力建设,使其能利用各种机遇,获得更多的资金。

当地妇女团体不能恰当地使用信贷服务实现拟定发展目标(位列第四),难以自我维系。就此而言,妇女非政府组织在监

表 6 影响当地妇女团体参与妇女非政府组织开展的活动的制约因素

题项	应答范畴 :频率(百分比)			平均值	排序	制约程度
	不同意	不知道	同意			
信贷服务不力	89(74.2)	26(21.7)	5(4.2)	1.30	2	主要
当地妇女团体成员不守法	6(5.0)	5(4.2)	80(66.7)	2.13	10	次要
当地妇女团体成员拒绝还贷	103(85.8)	11(9.2)	6(5.0)	1.19	1	主要
当地妇女团体成员拒绝履行预期的义务(受益人使用贷款不当)	90(75.0)	18(15.0)	12(10.0)	1.35	3	主要
领导层腐败且不诚实	63(22.5)	30(25.0)	27(22.5)	1.70	8	次要
开会时当地妇女团体缺席情况严重	65(54.2)	28(23.3)	27(22.5)	1.68	7	次要
贷款利用率低下	89(74.2)	19(15.8)	12(10.0)	1.36	4	主要
当地妇女团体领导者不太负责	10(8.3)	21(17.5)	89(74.2)	2.66	9	次要
当地妇女团体与其他团体联系少	67(55.8)	39(32.5)	14(11.7)	1.56	6	次要
管理贷款服务时存在偏见	73(60.8)	35(29.2)	12(10.0)	1.49	5	主要

资料来源 :作者实地调查 ,2006。

控贷款发放及其使用时可能有失误,或许应当对当地妇女团体成员没有能力偿还贷款负责。受益人无力偿还预付的小额贷款,当然并非为尼日利亚农村所独有,这从前面引用的博伊德(Boyd,2006)关于孟加拉乡村银行的资料也可以看出来。一个相互关联的发现是,对团队压力的惧怕,以及最终会受到团体中同伴的制裁,迫使受益人从其他来源(如放贷人、教会妇女协会或慈善团体)借贷,以履行还款义务。在这样的情况下,发放预付贷款的目的永远不会实现,而妇女非政府组织为支持妇女赋权和为促进家庭及社区发展而进行干预的目标也永远不会实现。

在本项研究中,没有一个当地妇女团体的领导力因素(如腐败、不诚实、不负责)被认为是主要的制约因素。这可能是因为大多数贷款发放和偿还活动都是由妇女非政府组织代表,而非由当地妇女团体领导来执行的,后者只是负责决定当地妇女团体成员中的哪些人能从贷款服务中受惠。但是,当地妇女团体领导者将从能力建设活动中获益,从而能够对哪些团体成

员应当从妇女非政府组织开展的小额贷款服务中受惠作出无偏见的选择。这有助于反驳针对当地妇女团体管理贷款服务时存在偏见的指责。然而,注意到以下这一点是令人欣慰的:当地妇女团体成员们经常参加会议,且未卷入非法行为。斯特林菲洛等人(Stringfellow et al.,1997)强调,对当地妇女团体而言,这些特质对增强内部凝聚力、发展内部责任制、增加对当地妇女的吸引力、向邻近区域的其他当地团体提供资助等都是有利的。

阿夸-依邦州当地妇女团体成员在参与妇女非政府组织前后的收入对比

皮尔森积矩相关分析表明,在当地妇女团体参与妇女非政府组织前后的所得收入之间,存在统计学意义上显著但较弱的正(因而是直接的)相关($r = 0.230$; $p < 0.05$)。其意义在于,增加当地妇女团体获取妇女非政府组织提供的贷款服务的机会,通常能增加其收入。此种低程度的正相关,与大多数被调查者仅从妇女非政府组织提供的贷款服务中受益一次是一致的。

结论与建议

关于妇女非政府组织对改善农村妇女社会经济状况所作的贡献,评价各异。本研究尝试记录农村妇女参与妇女非政府组织开展的赋权活动的感受以及她们对这些活动的评价。妇女非政府组织能迎合农村各阶层妇女的需要,设计满足这些妇女生存和基本生计需求的活动,通过增加收入来源、增强卫生意识和提高食品加工技能等活动,改善了参与者的社会经济状况。影响当地妇女团体成员参与妇女非政府组织活动的制约因素包括贷款服务不力、因贷款利用不善而导致无力偿还贷款等。但是,本文发现,在当地妇女团体参与妇女非政府组织前后的所得收入之间,存在某种正相关关系。这些活动对参与者而言,是有所裨益的,如果妇女非政府组织能针对更具可行性的项目提供更多的贷款服务,则能使参与者从中获得更多的收益。

从本研究中得出的若干建议,与先前许多学者对成功的妇女非政府组织的特点的观察,如陈及其同事(Chen et al., 2005)、国际粮食政策研究所(IFPRI, 2005)、卡普兰(Kaplan, 1999)、国际农业生产者联盟(IFAP, 1992)、威拉德和科普斯泰克(Wellard and Copestake, 1993, p.5)等的观察是一致的。如果这些建议得到采纳,并且恰如其分地体现在实践之中,则能使发展中国家的妇女非政府组织为促进尼日利

亚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社区发展作出更有效的贡献。

首先,妇女非政府组织应专注于由成员推动的议程。这意味着其应当集中力量资助有成功潜力的经济社会活动,这些活动在农村环境中具有可持续性,且与妇女的意愿和需求相符。它们还应当通过大众传媒和实质性的赋权活动,使农村妇女对这些组织及其开展的活动有更多的认识。最后,从这个角度来看,妇女非政府组织应当对信贷的发放程序及其使用进行监控,以防止这些资金被挪为他用,并降低违约风险。

其次,妇女非政府组织应专注于培养其服务对象的保存记录能力,支持更具持续性的社会经济赋权活动。

最后,需要对当地妇女团体领导层进行能力建设。参与者需要学习如何开发联动机制(linkage mechanism),以获得外部认可,赢得外部合法性,并从多种来源获得运营经费。此外,当地妇女团体领导层还要能识别并把握现实环境中的经济机遇,以实现自我维系,而不是过度依赖于妇女非政府组织。这将提高团体凝聚力和对社区发展活动的参与度。另外,公正地从团体成员中选择谁能受益于贷款服务也是非常重要的。当然,吸引和管理更广泛成员这方面的能力建设也是必要的,以确保当地妇女团体的凝聚力,实现团体的可持续发展。

[黄照静译]

References (参考文献)

- AKPABIO, I.A., 2000. *Determinants of levels of social participation in farmers' local organizations in Akwa Ibom State, Nigeria*. PhD dissertation,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al Extension Services. Ibadan: University of Ibadan.
- BEBBINGTON, A.J., MERRILL SANDS, D. AND FARRINGTON, J., 1994. *Farmers and community organizations in agro-research and*

- extension - functions, impacts and questions. Agro-Administration (Research and Extension) Network Paper 47. London: Overseas Development Institute.
- BOYD, P., 2006. Beyond micro-credit evangelism. *Pambazuka news*, 275. 26 October.
- CHEN, M., VANEK, J., LUND, F., HEINTZ, J., JHABVALA, R. AND BONNER, C., 2005. *Progress of the world's women 2005: women, work and poverty*. New York: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Fund for Women. 75-83.
- CLARK, W., 1994. *Human rights: the new consensus*. New York: Regency Press.
- DE KLERK, T., 2004. Financing of income generation activities in the wake of conflict. Available from www.networklearning.org [3 March 2010].
- DIKHO-WACHTMEISTER, M.S., 2001. Social capital. *World Bank PREM Notes: Gender* August.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1.
- EKONG, E., 2003. *Rural sociology—an introduction and analysis of rural Nigeria*. 2nd ed. Uyo: Dove Educational Publishers.
- IJERF, M.O. AND MBANASOR, J.A., 1998. *Modern organization and management of women cooperatives*. Owerri: Alphabet Nigeria Publishers.
-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AGRICULTURAL PRODUCERS (IFAP), 1992. *Towards self-supporting farmers' organizations*. Paris: IFAP.
- INTERNATIONAL FOOD POLICY RESEARCH INSTITUTE (IFPRI), 2005. *Women: still the key to food and nutrition security*. Washington DC: IFPRI.
- KAPLAN, A., 1999. *The development of capacity*. Geneva: United Nations Non-governmental Liaison Service.
- KARL, M., 1995. *Women empowerment: participation and decision-making*. London: Zed Books.
- KHANDKER, S.R., 1998. Using micro-credit to advance women. *The World Bank PREM Notes: Gender* Nov. Available from <http://www1.worldbank.org/prem/PREMNotes/premnote8.pdf> [23 March 2010].
- MUKUTE, M., 2002. The role of support structures in strategies for farmer organization federations. In: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management strategies in federations of farmers' organization*. Conference Proceedings Douala 10-14 December 2001. Wageningen: Technical Centre for Agricultural and Rural Cooperation.
- NATIONAL POPULATION COMMISSION (NPC), 2000. *Nigerian population statistics update*. Abuja: NPC.
- OFOSSU-APPIAH, B., 2003. Making NGOs more effective and responsive in a globalized world. Available from <http://www.globalpolicy.org/component/content/article/177/31636.html> [23 March 2010].
- QUISUMBING, A., 2003. What have we learned from research on intra-household allocations. In: A. Quisumbing, ed. *Household decisions, gender and development: a synthesis of recent research*. Washington, DC: IFPRI, 1-18.
- STEINBERG, N., 2001. World federalist movement background paper on CONGOs and QUANGOs and wild NGOs. Available from http://www.wfm-igp.org/site/files/AU_background_doc.pdf [23 March 2010].
- STRINGFELLOW, R., COULTER, J., LUCEY, T., MCKONE, C. AND HUSSAIN, A., 1997. Improving the access of small holders to agroservices in sub-Saharan Africa: farmer cooperation and the role of the donor community *ODI Natural Resource Perspective*. No 20. June London: Overseas Development Institute.
- UNITED NATIONS, 2000. *The world's women 2000: trends, and statistics*. New York: United Nations.
- WELLARD, K. AND COPESTAKE, G., 1993.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and the state in Africa - rethinking issues in sustainable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London: Routledge.
- WILLETT, P., 2006.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UNESCO encyclopaedia of life support system*. Centre for International Politics, School of Social Science. London: City University.
- WORLD BANK, 1996. *The World Bank participation source book. Environmentally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约鲁巴人的社会经济思想对尼日利亚扶贫工作的启示

乔尔·B·巴巴洛拉 阿德索基·奥尼
阿德莫拉·阿坦达 贝妮迪克塔·O·奥耶尤拉-奥修迪

尼日利亚是世界第 13 大石油生产国,但是,该国约 56%的人口却处于绝对贫困状态。本文将利用约鲁巴人(尼日利亚三大主要族群之一)的本土思想来检验有关贫困问题的流行理论。达尔文主义的、个体主义的、文化的、情景的以及结构主义的贫困理论要么将贫困现象归因于个体性因素,要么归因于广泛的经济因素。以关注个体因素(如对缺少技能的贫困群体进行职业培训)而忽视广泛的经济因素(如为穷人提供就业机会)为特征的反贫困战略只是对收入进行了再分配,而不能实质性地削减总体贫困。通过分析约鲁巴人有关贫困的谚语,我们发现流行理论与约鲁巴人的贫困思想之间存在一致性。约鲁巴人相信存在着将导致苦难的慢性贫困(*osi*,奥西)与暂时贫困(*ise*,伊塞)之分,认为穷人可以凭借个人的努力(如培养积极的工作态度、努力工作、控制生育等)及支持系统(如创造就业机会、粮食安全等)的帮助来摆脱贫困的陷阱。他们还相信创造就业机会是最佳的反贫困战略,认为通过消除饥饿可以使贫困变得不再重要。本文以这两句谚语为依据,指出扶贫的重心应该放在创造就业机会和保障粮食安全上。此外,本文建议,应认真研究尼日利亚其他重要部落有关贫困问题的社会经济思想,以便在尼日利亚确立一种得到全国一致认同的、具有本土文化特色的反贫困战略。

[焦 兵译]

尼日利亚阿夸-依邦州的妇女非政府组织及针对农村妇女的赋权活动

英尼奥邦·A·艾克帕比奥

本研究尝试记录尼日利亚阿夸-依邦州农村妇女参与妇女非政府组织开展的活动的感受及对这些组织在当地开展活动的评价,并结合此撰写报告。研究的具体目标包括对以下几个方面作出评估:妇女非政府组织的社会经济状况、受益人对参与妇女非政府组织活动的影响因素的认知、妇女非政府组织对改善受益人社会经济状况的贡献、影响受益人参与妇女非政府组织活动的制约因素等。选取的样本包括来自 24 个当地妇女团体的 120 位受访者,这些妇女团体隶属于研究区域中的 3 个活跃的妇女非政府组织。结果显示,妇女非政府组织迎合了农村妇女的需求。农村妇女通常参与获得认可的、可行的妇女非政府组织的活动,这些活动满足了参与者的需求。结果还显示,妇女非政府组织通过增加收入来源、增强健康意识、提高食品加工技能来影响受益人的经济社会状况。影响受益人参与妇女非政府组织活动的因素包括信贷服务不力、预付贷款利用不善导致还款水平低等。妇女非政府组织有能力对人类发展和社区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本文就此提出了建议。

[黄照静译]

艾滋病的社会经济影响及尼日利亚南部农民可能感染艾滋病的风险行为

艾贝尤米·塞缪尔·厄耶卡勒
托鲁洛普·奥拉耶米·厄耶卡勒

本文分析了艾滋病的社会经济影响,尼日利亚南部农民对艾滋病社会经济影响